

2013 年度清史研究综述

林存阳 梁仁志 李立民 王士皓 李华川 鱼宏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本年度清史研究稳步推进,成果丰富,亮点突出。学科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学术对话活跃,海内外学者间的互动愈益富有成效;史实讨论趋于深入和细密,对现实问题更加观照;理论探索更趋自觉和多样化,新的研究路径和趋势不断涌现;成立了故宫研究院等新的科研机构等。

一、学术会议

本年度围绕清史及与清史有关的问题,学术界举办了 10 余次学术研讨会和活动。如“纪念顾炎武诞辰 4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清代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汉语文献与中国基督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届国际满文文献学术研讨会”、“宫廷典籍及东亚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故宫学与明清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纪念康熙统一台湾 33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第十五届清史学术研讨会”、“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明清之际的探索——恭祝何龄修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等。

综观这些学术会议和活动,大体呈现出如下四个特点:(一)由于两年一度的综合性清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各个领域的研究者相聚一堂,较集中地展现了清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二)与清史研究紧密相关的一些交叉学科或新的研究范式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故宫学”与清史研究的密切关系、宗教史领域“西方对华传教”研究范式向“中国的基督教”研究范式的转变等;(三)清代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得到进一步重视,民间文献的价值愈益受到关注;(四)事件性主题会议,如纪念顾炎武诞辰 400 周年、康熙统一台湾 330 周年等,除了在学术上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进一步细化外,还着重探讨了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二、政治史研究

皇权。杨珍《历程 制度 人——清朝皇权略探》(学苑出版社)深入、系统地探析了清朝皇权的兴衰、后妃制度的发轫等若干宫廷制度的建立与变化,以及皇帝、大臣、满洲宗室和皇室女性等众多政治核心或重要人物。并指出,尚未达到中国封建皇权发展顶峰的清朝皇权,依然具有较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清朝皇权在有效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同时,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则起了很大阻碍作用。乔治忠、孔永红《康熙帝与孝庄太皇太后政治关系的解构》(《齐鲁学刊》2期)认为康熙为了实现其政治革新,不得不哄好颇为守旧的孝庄太皇太后,从而消弱朝廷中的守旧势力,以推行“汉化”和“儒化”的政治改革。林乾《康熙惩抑朋党与清代极权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按照康熙时期朋党集团发展及其衰败的时间顺序,将历史事件与制度变迁相结合,对贯穿康熙一朝的朋党现象进行了多视角地探析,指出康熙利用朋党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加强皇权、针对他们的危害程度采取不同的惩抑策略、在同朋党的斗争中把有利于提高皇权的一些“创造”加以制度化推广等,皆体现出他确实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雍正继位疑案仍是学者比较关注的话题。罗冬阳《朝鲜使臣见闻记述之康熙史事考评——以争储及雍正继位为核心》(《东北师大学报》2期)认为从李氏朝鲜遣清使臣《别单》中,可以看到雍正初年雍正帝皇位合法性所面临的挑战。吴秀良《允禔更名与雍正继位问题再探讨》(《清史研究》3期)尝试通过考订皇室玉牒,来化解持雍正继位“合法说”的学者们在史料解读问题上的分歧。常建华《雍正帝打击太监魏珠原因新探——魏珠其人其事考》(《清史研究》3期)认为雍正帝打击魏珠,未必是因其目击康熙帝临终情景、得知雍正帝得位不正或者说是篡位的秘密,而是因其在康熙晚年与储位争夺对手允禩、允禊关系较好而仇视他。王海燕《清东陵“皇会”的创立和影响——兼论雍正与允禔的关系》(《东岳论丛》7期)则通过“皇会”考察了允禔在守陵期间的遭遇,以此对雍正继位问题进行反思。

政策。潘志和《国家认同:康熙皇帝刊行、整理〈性理大全〉的政治指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3期)通过对康熙刊行、整理《性理大全》的分析探寻其政治理路,认为康熙的圣君形象是遵照程朱理学行王道而树立的。刘凤云《雍正朝清理地方钱粮亏空研究——兼论官僚政治中的利益关系》(《历史研究》2期)认为雍正朝的清理钱粮亏空,是以确保国家利益为前提,针对财政亏空和吏治腐败,对官僚集团实施的一次经济上的大清查,这一过程反映了官僚政治中的诸多利益关系;又其《嘉庆朝清理钱粮亏空中的艰难抉择——兼论君臣在地方财政整饬中的不同认

识》(《中州学刊》5期)认为嘉庆清理钱粮亏空的施政方针是不切实际的,嘉庆帝与各省疆臣之间在整饬地方财政上的不同认识,是由其各自的立场所决定的,而立场背后当是利益的驱动。

制度。苏亦工《官制、语言与司法——清代刑部满汉官权力之消长》(《法学家》2期)从语言和人事政策两个角度,勾勒出清代刑部满汉官权力消长的大致脉络,展现了从清初满官垄断刑部到晚清出现的所谓“专家掌部”现象的反差。郑永华《清代宗室世子考》(《清史研究》1期)对清代宗室世子制度的演变过程及实施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自顺治四年(1647年)初始倡世子制度,八年(1651年)正式予以封授,到雍正十年(1732年)册封最后一位宗室世子,在清代共实施了90余年。吴昌稳《以公家之财济公家之用:清代协饷制度的创建》(《学术研究》1期)认为清代协饷制度的出现是军制变化的结果,也是传统社会制度建设走向成熟的标志。彭洪俊《“民”与“汉”:清代“民户”的划分及其实质》(《云南社会科学》3期)认为在清代人口分类语境下,“民”或“民人”明显具有“汉”或“汉人”的内涵,清代民户与各少数民族人户的民族性质差别,是国家人口分类管理与赋税制度实施的基础。李晓龙《盐政运作与户籍制度的演变——以清代广东盐场灶户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期)认为在具体的区域中,户籍制度的变化要受到实际政治运作的影响并展现其不断调适的一面。

薛刚《清代琿春驻防旗官补正》(《历史档案》2期)依据档案、实录等原始资料,还原了琿春驻防旗官原貌。孙守朋《清朝汉军六品以下职官出旗反复现象阐释》(《求索》2期)认为吏治和八旗生计问题是清朝汉军六品以下职官出旗反复现象的重要影响因素,后者起着主导性作用。刘丽《论清初汉官的疏离心态》(《北方论丛》3期)认为高压的民族政策、儒家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和政治际遇,是造成清初贰臣心态的三个主要原因。张晨《试论清代中央六部书吏》(《湖北社会科学》6期)对清代中央六部书吏在国家日常政务中的作用及弊端进行了考述,认为尽管清代历朝政府都对书吏严格管理,不断整饬,但书吏之弊是封建社会的一项痼疾,故而难收其效。

行政。岁有生《清代州县经费研究》(大象出版社)从州县财政的地位、州县衙门经费、祭祀经费、恤政经费、工程经费、文教经费等方面,探讨了清代州县一级行政机构的财政运作。刘锦《边境纠纷与清朝借助达赖喇嘛处理青海蒙古事务的开端》(《清史研究》1期)利用满、蒙文档案,对清廷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参与处理蒙古事务进行了考察,认为该事件对清代西北边疆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黄博《试论清初西藏地方政府在阿里地区政教统治的建立》(《贵州民族研究》3期)梳理了清初西藏地方政府在阿里地区政教统治建立的过程。欧磊《清代基层社会与上层政权结构嬗变——以清中后期居乡缙绅活动为视角》(《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居乡

缙绅的本质,决定了他们的理想和目的不是实现地方自治和独立,而是要求将自己和自己组建的基层社会武装纳入正统的上层政权。孙兆霞、吕燕平《预灾机制形成中的国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道光时期安平县便民仓实践的人类学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认为便民仓的运作机制,有赖于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机制的危机时期与日常运转相沟通,在政府施治与地方性智慧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与灾难危机应对行动逻辑的结构性整合,提升社会自主性。

事件。梁洪生《重评清初“驱棚”——兼论运用地方性史料对清史研究的检讨》(《社会科学》5期)认为学者应跳出传统“农民战争”研究的视角,对土著民众的苦难遭遇及利益诉求予以理解和重视,进而将不同地区的“三藩”战事考察,从单纯的政治史、军事史,深化为一部有血有肉的明末清初区域社会生活变迁史。

三、经济史研究

传统经济史的重点领域如海关、漕运、对外贸易、手工业、粮价等方面,继续有文章发表。如吴琦《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漕粮的截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许光县《清代团体土地使用权探析》(《西北大学学报》5期)、燕红忠《清代牙商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等。这类文章都集中在传统经济史的重点领域,利用个案材料和部分档案进行专题研究,就某一细节问题进行研究、比对得出结论。

矿业以及农林等领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成为本年度研究的热点专题。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人民出版社)以国家和资源为视角,借助现代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滇铜、黔铅的开发与管控、运输地理等问题加以探讨,揭示了国家在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常建华《民生与秩序:雍正朝开矿问题新探》(《传统中国社会与明清时代:冯尔康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认为雍正帝继承了康熙后期的开矿政策,采取了以禁求静的策略,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农林领域等的研究如万明远《清代黄河决溢对淮河流域农业生产影响研究》(《丝绸之路》2期)、何文林和韩光辉《清代直隶地区水利营田的演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3期)、潘春辉《清代河西走廊农作物种植技术考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1期)、吴建勤和胡安徽《唐至清代政府药材需求初探》(《农业考古》3期)等。这些论文数量众多,总体上拓展了传统经济史学科的范围与视野,在实证研究方面也有建树,关注焦点多与现实社会政治需求有一定联系,是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本年度还出版了一些专门的经济史资料和专著。谭徐明主编的《清代干旱档案

史料》(中国书籍出版社)收集了全国34省区划范围的部分旱灾史料。尹全海等整理的《中央政府赈济台湾文献·清代卷》(九州出版社)收集了清政府赈济台湾的相关原始文献,包含起居注档案、兵部档案、户部档案、奏折等各种文献形式。倪玉平《清代嘉道财政与社会》(商务印书馆)通过对嘉道时期财政岁入的分析研究,指出地丁、盐课和关税仍然是财政岁入的三大支柱,特别是地丁,依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反映出嘉道时期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与清代前期没有太大变化。王德泰《清代前期钱币制度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则将清代前期的铜钱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对制约与影响清代前期铜钱制度(钱币制度)发展变化的诸多因素进行了研究,并以此来揭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与以往相较,近来关于清代经济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越来越注重利用专门档案与数据材料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这也是近十多年来从过去研究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等宏大主题转向具体问题研究的大趋势的一种表现。除了传统手工业棉业、矿业、商业外,近年引起重视的、与现实社会经济有密切关系的灾害对经济的影响、移民经济、生态、农业、水利、林业、区域经济等,超过传统范围,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二是新兴领域发展势头强劲。从总体上看,虽然传统经济史范畴中土地关系、漕运、手工业、盐业、商业贸易、海关等主题的研究依然在坚持,但矿业、农业、木材、流域、生态环境、灾害等领域的研究则逐渐成为主流。这反映出经济史学科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特点,更贴近时代的需求。

四、学术和文化史研究

综合。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商务印书馆)对清初学术和以全祖望、章学诚、赵翼、王鸣盛、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史学,以及以吴、皖、扬州三派经学家为代表的不同地域学术在乾嘉间的分野等问题,进行了颇具学术个性的阐述。南炳文《明清考史录》(人民出版社)共有四部分,其中一部分对清初遗民朱舜水、戴笠、邱维屏、李世熊等23人的生平事迹(前人失载或记载互异者)作了50余篇考证,纠正了《清史稿》的多处失误。杨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风转轨与清初孟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认为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承袭明末悄然兴起的反思理学运动,学风出现了深刻变化。作者认为清初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推身移步隐含了清代学风的新走向,在方法论和目的论上影响着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

学术思想。陈祖武《高尚之人格不朽之学术——纪念顾亭林先生诞辰四百周年》(《光明日报》2013年9月5日第11版)对顾炎武的为人为学作了高屋建瓴的评价,

认为“以言耻为先，将为人学与为学合为一体，不惟成为顾亭林先生的毕生追求，而且也作为当时及尔后的中国学人，树立了可以风范千秋的楷模”。陈居渊《汉学更新运动研究：清代学术新论》（凤凰出版社）比较客观和完整地揭示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由汉学精英自发的汉学更新运动。张瑞龙《论十九世纪上半期理学在知识界的状况》（《清史研究》1期）认为嘉庆朝前期理学处于衰微至极的尴尬境地，天理教事件不但导致清廷在文化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也使得民间那些倡导理学的意见成为官方政策和行为；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理学在嘉庆朝后期尤其是道光朝逐渐恢复生机，并在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层面有明确体现。王惠荣、张爱青《清代今文经学复兴原因新论》（《山西师大学报》3期）认为庄氏家族瞩目公羊学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结果，必然性在于乾嘉年间考据学如日中天之际出现对新义理的呼唤，而任职上书房则对庄存与治《春秋》推崇《公羊传》、阐发西汉微言大义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而影响到西汉今文经学在清中期的复兴。刘瑾辉《清代〈孟子〉义理学四大家综论》（《中山大学学报》4期）对清代《孟子》义理学的代表——黄宗羲《孟子师说》、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焦循《孟子正义》、康有为《孟子微》的特点和学术指向进行了考述。徐道彬《乾嘉学派中江藩的归属问题探析》（《清史论丛》2013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认为作为乾嘉汉学中坚人物的江藩，以“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属之均难置其位，故提出了对三派之名能否成立的质疑。钟玉发《阮元学术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考据学成就与思想、训诂以明义理、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与实践，以及诂经精舍、学海堂与晚清学术流变等方面，对阮元的学术思想和影响进行了详细探讨。程尔奇《晚清汉学研究》（人民出版社）通过详细梳理、探讨晚清汉学的演进历程、地域分布与血脉传衍、新著述，以及与宋学、今文经学的关系等问题，揭示了晚清汉学的趋向及其历史地位。王惠荣《晚清汉学群体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则从晚清汉学、汉学群体、汉学群体与社会变迁三个方面，较为系统、深入地探讨了晚清汉学群体分布区域及学术特征、汉学家的思想取向与西学东渐、西潮冲击下汉学群体思想的发展演化、汉学群体的近代社会实践以及在近代社会中的历史作用等问题。

文化政策。罗晓良《试析康熙朝中叶对汉族文化政策与大一统政治之关系——以安定江南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康熙帝在争取汉族精英对清朝认同的同时，还利用多元文化的影响为其大一统政治服务。吴蔚《从文字狱看雍正的“取文过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3期）认为雍正以尚用为本的文学观，导致他对文辞作用的过度夸大，在强化统治的过程中，一方面过度解读臣民的文字，另一方面过于广泛地运用文字的形式传达政令，达到极端的地步。吴航《清朝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纂修的讨论》（《史学史研究》1期）认为南明历史书法，是清朝官修《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的做法明显地体现了清朝官方弱化南明历史的政

治企图和学术倾向。

文化现象。林存阳《清中叶朝廷和基层旗人对满洲典礼的张扬》（《清史论丛》2013年号）认为在“崇儒重道”政治文化导向下，清廷“以礼为治”的取向，一方面表现出以满洲皇帝为核心的高层统治者对中原汉族文化的借鉴、认同和利用，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他们不愿放弃自身满洲礼仪风俗传统的情节，而这一情结不仅体现在官方编纂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上，也体现在中下层旗人的各种撰述中。陈宝良《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与士大夫精神史的波折》（《浙江学刊》2期）认为清初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出现了内在转向：一部分士大夫从制度与精神两大层面对明朝的灭亡加以反思与总结；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受制于新朝强权政治的威慑，过分留恋于过去，导致感伤主义精神盛行一时。洪桐怀《清初政治文化生态与桐城派文风转型》（《中国文化研究》1期）认为作为异族统治者，清廷必然寻求文统与道统的合一性，最终证明其治统的合法性，桐城派即因此契机而生发兴起，对有一清一代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均产生了较强的导向作用。李娜《试论南书房世家的形成原因》（《清史论丛》2013年号）认为南书房行走世家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且在清朝文化史上具有传承意义，在政治史上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文献典籍。谢贵安《清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仅对《清实录》的很多记载逐一进行了考订和辨析，从而弄清该书的信实部分和不实之处，还探讨了其在清朝的致用问题。王蕾《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藏书的“藏”与“用”出发，系统地研究了清代藏书收集、保存、保护与流通利用的观念、思想与理论方法。李立民《“以书经世”与“藏而为学”：管庭芬藏书思想刍议》（《清史论丛》2013年号）以《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为中心，考察了管氏的藏书思想，认为他“以文献存文化，以文化济乱世”的藏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晚清以来公共藏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展龙《万斯同〈明史〉序、论的史学价值》（《史学史研究》2期）认为万斯同的序、论以儒家思想为圭臬，通过深刻反思和评论一代政治兴衰、典章得失、生民否泰和人物善恶，不仅寄寓了浓郁的故国之思，而且为清初统治者的治国之道提供了最为切近的历史训诫。李伟国、尹小林《重审〈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二十四史”之价值》（《学术月刊》1期）认为清代乾隆初年，刊行武英殿本“二十二史”，之后四库馆开，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首次形成对中国历史传承意义极大、流传极广的“二十四史”。江曦《清代版本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采取宏观考察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既勾勒了清代版本学发展的大势、归纳了其思想与方法，又分别对清前、中、后三期具有代表性的版本学家和成果进行了深入探究。

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180册《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收录了嘉庆元年至宣统三年间军机处收发文件的原始登记簿，史料价

值颇高,该文献的出版对清史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陈祖武历时多年整理出版的《榕村全书》(福建人民出版社),收录了李光地著述 30 余种,为深化李光地及清初历史问题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资源。田家英所藏清代学者书札的面世(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深入发掘、探究清代学者间的交往和学术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依据。

五、科举与教育史研究

科举人物。林上洪《清代科举人物师承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以《清代朱卷集成》中的会试卷履历为主要资料来源,对清代科举人物的师承及与教育和考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马镛《清代乡会试同年齿录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传记史料、家族史料、社会史料、教育史料等多个角度,对进士考取前的任官经历、祖上官职迁转、祖上三代社会分层、家族成员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活动、士子的婚姻家庭状况、进士的城乡迁移流向、进士的受教育经历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探讨。王寅《清初经学复兴与李光地倡导的科举改革》(《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 期)认为李光地所倡导的科举改革不仅推动了经学的发展,也为后来乾嘉学派崛起准备了条件。

制度与政策。李世愉《清代科举中额的分配原则及政策导向》(《社会科学战线》3 期)认为清代乡会试中分地取士的政策,促使文化落后地区的士子更加奋发向上,促进了边远、落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刘希伟《清代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教育机会冲突问题——关于土客学额之争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3 期)认为清代学额配置中存在专为流动人口而实行的入学方法,即寄籍应试入学政策,但因流入地原有土著士民的阻挠而产生无法顺利应考的土客学额纷争现象。陆胤《学潮、学科与学制——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在京参与学务考》(《清史论丛》2013 年号)分析了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九年来京参与学务对近代学术文教转型的影响与意义。

地方科举与教育。李兵《清代两湖南北分闱再探》(《历史档案》1 期)详细爬梳了两湖南北分闱的原因、过程以及新建湖南贡院的情况。朱玉麒《清代新疆官办民族教育的政府反思》(《西域研究》1 期)认为新疆自建省以来,不同级别和类型的学校纷纷建立,但是教育投入之巨与收效之微的反差,迫使政府不得不对民族教育问题加以反思,并采取了一些解决方案;清代遗留的这一教育症结和积极回应,至今对有效治理新疆仍具借鉴意义。张晓婧《清代桐城桐乡书院的管理特色》(《安徽师范大学学报》3 期)认为桐城桐乡书院的管理特色主要体现为“行政管理的董事制和

共议制”、“学业管理的兼顾制和激励制”、“经费管理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三个方面,这一管理特色对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科举事件。陈维新《乾隆时期广西乡试舞弊案简述》(《清史论丛》2013年号)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阐述了乾隆时期广西乡试舞弊案的原委及朝廷处置的经过。关晓红《停罢科举后的特科余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1905年清廷宣布立停科举,主要针对常科,并未触及恩科与特科,随着各省学堂的兴办、扩展及西学风行、儒学衰微,不断有人呼吁举办制科,借此保存国粹。苏全有、崔海湛《论清末民初的复科举主张》(《福建论坛》1期)认为科举革废所带来的另面影响,加之新式教育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致使清末民初不断有人提出恢复科举。

六、民族和边疆史研究

综合。乌云毕力格主编的《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探讨了清代蒙、满、藏等民族史和蒙古、西藏、东北等边疆地区相关的史学问题。

民族行政区域与政策。许新民《论清咸同起义以来云南土司治策——以承袭与改流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清咸同以来在云南地区所施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并非彻底革废土司,而是使土司“虚衔化”,剥夺了土司原有的行政管理权。陆韧、凌永忠《元明清西南边疆特殊政区研究》(人民出版社)通过对西南边疆地理环境和民族社会环境的全面考量,廓清了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特殊政区的设置特点。刘敏《清代至民国时期三江区域移民对赫哲族社会发展的影响》(《学术交流》2期)探讨了清代至民国时期汉族等民族移居三江区域对赫哲族、满族等先民的影响,认为汉族等民族的移居改变了这一区域的人口与民族结构、生态环境与语言环境、生产与生活方式、传统观念与习俗。许曾会《明清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民族观念》(《学习与探索》1期)认为明清两朝民族政策总的方针是威德兼施,这样的民族政策对明清纂修《元史》和《明史》分别呈现出大民族主义和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

边疆建设。甘桂琴《清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治疆功效》(《史学月刊》6期)认为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是清朝统一新疆后派驻南疆的最高军政长官,清廷对参赞大臣寄予厚望,希望其既是公正处事、正己率属的吏才,又是统率官兵、保边卫疆的将才,在各方面都要有所建树。祁美琴、褚宏霞《清代嘉道时期新疆移民落籍方式初探》(《西域研究》2期)通过对学界关注较少的嘉道时期新疆移民状况的考察,探讨了移民的落籍过程和途径。罗布《清初甘丹颇章政权权威象征体系的建构》(《中国藏学》1期)认为清初蒙藏联合治藏格局中,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寺院

集团在甘丹颇章政权内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以确立、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教地位和统治权力。林枫、孙杰《清代台湾义冢的破坏与维护》(《厦门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清代台湾义冢破坏的主要表现及官方的维护措施,认为这一问题反映出台湾作为边疆社会的色彩,也印证了其作为移民社会的移植性特征。

七、社会史研究

社会组织与机构。段自成《论清代乡约职能演变的复杂性》(《浙江学刊》2期)认为清代乡约的职能演变,不仅导致乡约类型和行政型乡约功能的多样化,而且引起教化型乡约和行政型乡约在同一地区同时并存。吴滔《清代广东梅菪镇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组织》(《清史研究》2期)探讨了从明清之交地方动乱到清中叶以后社会秩序重组期间梅菪镇空间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化轨迹。王洪兵、张松梅《清代京师的粥厂与贫民救助》(《东岳论丛》5期)分析了清代京师粥厂的两种类型(官办、官督绅办)和意义,认为清代京师粥厂对于救助贫民、安抚流民、挽救民生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陈冬冬《清代台湾方志中所见郑氏政权之“灾祥”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清代方志中对郑氏集团灾祥的记载,反映了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混合的历史观念,也是研究台湾地区气象、灾荒的重要史料。鱼宏亮《己庚旱灾及其政治影响》(《清史论丛》2013年号)以光绪二十五年北方黄河流域发生的旱灾为切入点,探讨了这次灾害对清代政局的影响。刘景莲《清代泥石流灾害刍议》(《清史论丛》2013年号)梳理了清代发生泥石流的地区及形成的灾害概况,分析了政府的相关举措及其借鉴意义。哈恩忠《乾隆朝整饬江河救生船档案》(《历史档案》1期)认为乾隆时期清政府大力整饬江河大湖危险处所设置的救生船只,一方面形成了周密的江河救生船网络,有利于社会安定,另一方面救生船只及时救助遇险商旅,减少损失,客观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渠桂萍《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基层政权代理人的“差役化”——兼与清代华北乡村社会比较》(《中国社会科学》1期)对20世纪前期地方自治公职人员与清末“新政”之前的清代保甲长、里甲长、乡约等乡村控制组织权力主角加以比较,以此探寻传统历史的延续与回归问题,希望沿着中国乡村自有的发展轨迹构建“本土化”理论解释框架。

社会生活与风俗。林永匡《清代衣食住行》(中华书局)是一部比较通俗的、反映清代日常社会生活的著作,对了解清代社会经济的具体形态有一定参考价值。王君柏《顾炎武的风俗论与社会诚信建设》(《贵州社会科学》4期)指出,顾炎武的风俗论认为,良好的风俗首先在于庙堂的提倡,其次在于乡党的维持;上倡之以名教,下重之以清议,再将此信誉延及于子孙,则可以救法制之偏,以保风俗醇

美、诚信大昌。冷东、张超杰《清代中期的广州花船》（《史林》1期）认为清代中期随着广州社会的发展及商业的繁荣，娼妓业也有所发展，并以水乡特色的“花船”最为著名，而花船有着巨大的市场和顾客群体，官吏、商人、文人墨客、性饥渴群体是花船的主要光顾者，也是接待外国使节、消费西洋器物的重要场所，与外国人士在华生活有一定联系。胡梦飞《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水神信仰的历史考察——以运河沿线区域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3期）认为崇祀水神既是明清国家治理黄运水患的重要手段，也是黄运沿岸民众的精神慰藉。岳立松《清代花谱传播与京城文化》（《山西师大学报》1期）梳理了清代花谱传播的对象、形式，认为清代花谱传播带有鲜明的城市特色，反映了京城的娱乐消费、文化生产及士人生活。谢宇《清代皇陵堪輿考》（华龄出版社）从堪輿学角度，对清代皇陵建造地点的地形、地貌、景观、气候、生态等要素作了深入研究。王静《清代走方医的医术传承及医疗特点》（《云南社会科学》3期）认为清代走方医在技术来源上主要有家族传承、地域熏陶、自学和拜师四种方式，并从医术传承、医疗诊治等方面分析了其医疗特点。

城市历史发展演变。张慧芝《天子脚下与殖民阴影——清代直隶地区的城市》（上海三联书店）考察了直隶省城镇近代化进程的大致脉络及其内部主要分区特征、“天子脚下”的地缘位置与直隶省城市近代化、“殖民阴影”的社会背景与直隶城市近代发展、以海河流域为核心的生态腹地与京津等中心城市的发展等问题。黄滨《明清珠三角“广州—澳门—佛山”城市集群的形成》（《深圳大学学报》3期）认为在明清时期，这一城市集群贯通内外，不仅成为珠三角、甚至广东全省经济中心城市，而且构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群。

生态环境。徐文彬、钟羨芳《明清福建生态演变与虎患》（《福建论坛》6期）认为在猛虎威胁下，民众或笃信伏虎神，或练拳防身，或专职猎杀，塑造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还有彭恩《清代湖北经济开发与森林生态环境变迁》（《农业考古》1期）。

家族与人口流动。王日根、仲兆宏《明清以来苏闽宗族祠堂比较研究》（《安徽史学》3期）认为明清以降中国境内宗族组织获得了巨大发展，与此相适应，民间社会倾力建设祠堂的积极性高涨，明清时期的官府尤其是清政府对祠堂建设采取鼓励和劝导政策，将之视为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仲兆宏《明清苏闽族谱内容比较研究》（《苏州大学学报》4期）认为明清以来，相对于福建宗族，江苏族谱编撰条目更为丰富，科第也更为昌盛，祠堂义庄数量多且规模大。黄权生、罗美洁《明清麻城军事人口迁徙与“麻城孝感乡”的祖籍认同》（《湖北社会科学》1期）认为四川的“麻城孝感乡”移民文化认同是经过元明清三代以麻城（孝感乡）的军事移民迁徙累加而形成的结果，这些军事移民活动促成了“麻城孝感乡”移民祖籍文化的认同。

此外尚有孟文科《清代秦巴山区汉人移民的生计模式及其转型》（《农业考古》2期）。王云红《清代流放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通过对流放制度与流放实践互动关系的考察，揭示了清代流放政策的有效性、灵活性及其面临的困境。王洪兵《清代京师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北方论丛》2期）认为清代统治者试图通过开办粥厂截留流民以及留养、资遣等举措消弭流民对京师社会秩序的冲击，这套机制对维护京师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潘春辉《从入迁到外流：清代镇番移民研究》（《历史档案》1期）探讨了清前期镇番县人口的移入与中后期人口的迁出现象，以期深化对清代西北地区的移民问题、边疆政策及环境变迁等问题的认识。安国楼、史彬彬《清统一之初的台湾移民及其风俗》（《中州学刊》4期）认为大陆移民使台湾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习俗发生了变化，向学之风也较此前有所发展。

八、中西关系史研究

文献整理。在清代中西关系史领域，本年度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无疑是中国台北利氏学社影印出版的《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34册）一书。此书由比利时鲁汶大学钟鸣旦教授、杜鼎克博士主持编纂，在鲁汶大学、上海图书馆和台北利氏学社海内外三家机构合作之下，历时6年，方告完成。《续编》收录明清中西人士所撰有关天主教著作84种，是目前已出版的几种丛书中规模最大的一种。其中法国传教士贺清泰的《古新圣经》和中国教徒张星曜的《天教明辨》占了14册的篇幅，是该丛书最为重要的两种文献。此外，无名氏的《敬一堂志》和《人类源流》也是罕见的史料。其他文献的价值，还有待学界的进一步研究。不过，即使暂时忽略明清传教史的角度，这样大规模的文献，对于理解明清时期民众信仰世界和精神生活，仍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黄兴涛、王国荣编的《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4册，中华书局）则对不少重要而珍贵的西学文本进行了“整合”，为学界同仁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便利。由于这些著作广泛涉及到宗教神学、教育学、伦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音乐学、美术学、文艺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数学（主要是几何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学科，无疑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教在华传播史和明清学术文化史等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专题研究。顾卫民《“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1415—170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康志杰《基督的新娘——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勇《中国茶叶与近代荷兰饮茶习俗》（《历史研究》第1期）、韩琦《明末清初欧洲占星术著作的流传及其影响——以汤若望的〈天文实用〉为中心》（《中国科技史杂志》第4期）、吴伯娅《广州十三行与入华

传教士》(《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李华川《〈李安德日记〉节译》(《清史论丛》2013年号)等,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皆有所推进。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学者唐纳德·F. 拉赫和埃德温·J. 范·克雷《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一书翻译出版(周宁总校译,人民出版社),该书试图从观念史、文化史的角度,探讨近代欧洲形成过程中亚洲所提供的物质、精神资源及其发挥的作用,对于传统的“欧洲中心观”史学(主要研究西方文明对于亚洲的影响),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书中有关中国的研究,为16—17世纪的中西关系,描绘了一个非常广博而又具体细致的宏大背景,既拓宽了研究视野,更为具体问题的论述树立了周边国家的参照体系,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尽管此巨著乃未竟之作(1965年第1卷问世以来,至1993年出版了3卷9册,遗憾的是,由于两位作者相继去世,留下第4卷未能完成),但国外史学界仍对是书给予很高评价,有学者认为堪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相提并论,是与伟大的历史主题相匹配的伟大著作,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念,也为新的历史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思想素材。

西文著述。本年度在欧美出版的清代中西关系史著作至少有10余种。其中,比利时汉学家高华士的《中国的西方知识图书馆:中欧之间西文书的流通》[Noe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ca. 1750)*, Vol. 2: Formation of Jesuit librarie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 U. Leuven],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了耶稣会在中国的文化传播工作,探讨了西文书在中国的流通渠道,史料相当丰富。美国学者克拉克的《中国的圣徒:清代天主教殉道研究》[Anthony E. Clark, *China's Saints: Catholic Martyrdom During the Qing (1644—1911)*, Lehigh University Press]主要以晚清时期为例,说明教徒殉难不但没有阻止信仰传播,反而在教难后天主教社区的重建过程中,对于天主教本土化进程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除以上各领域研究外,在研究理论与方法总结方面,本年度也有新的进展。如刘凤云《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史学月刊》1期),从范式转换、“新史学”的热议、“新清史”的争鸣、宏观与微观等4个方面,对30年来清史研究中经济史研究的演进路径、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地、中西学界的对话、政治史热点与研究视角的转换等,进行了详细梳理和剖析。这一反思,对学界同仁无疑具有启发意义。日本学者森正夫等编,周绍泉、栾成显等译《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涉及了明清史研究中政治、经济、文化、宗族、秘密结社、土司制度、徽州文书等诸多议题,为我们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九、两点反思

本年度的清史研究，尽管从总体上看健康发展，但也存在两点需要反思的问题，而这或许在当下的史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共性。

一是关于个案、区域研究与综合研究的问题。综观本年度的成果，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即个案研究与区域研究占了很大比重。这些研究对深化一些具体问题，无疑是必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选择某一具体问题探讨，如果仅就事论事、着眼于一时一地，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很难与更大范围、更长时段的史实相观照。这就提醒研究者在设定题目与主题时，需对论题所涉及的理论框架和解释范围，具有大的视野，保持敏感性，不然就容易陷于碎片化，难以做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因此，对于清史研究中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依然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二是国内清史学者的“中国中心观”问题。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意在强调研究中国历史不仅要关注“外在因素”的影响，还应重视从“中国内部”来进行考察，但这并非要否定“外在因素”。本年度的清史研究著论，比较偏向于关注“中国内部因素”，而对“外在因素”的讨论较为薄弱。有鉴于此，如何避免从一端（“欧洲中心观”）走向另一端（“中国中心观”），便成为史学界尤其是清史学界同仁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